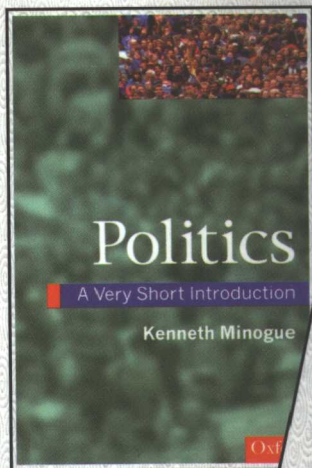


牛津
Oxford
精选



〔美〕肯尼斯·米诺格著
龚 人译

当代学术入门 政治学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入门 政治学

〔美〕肯尼斯·米诺格著
龚 人译

Polit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Kenneth Minogu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 / [美] 肯尼斯·米诺格著；龚人译。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
(牛津精选)
ISBN 7-5382-5021-2

I. 当… II. ①肯… ②龚… III. 政治学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3264 号

Polit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Kenneth Minogue, 1995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总策划、总发行人：俞晓群

责任编辑：杨力

美术编辑：宋丹心

装帧设计：郑在勇

技术编辑：袁启江

责任校对：马慧

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

印刷：沈阳新华印刷厂

发行：辽宁省新华书店

版次：199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32开

字数：86千字 插页：4

印张：4

印数：1—10000册

定价：8.60元

前 言

托玛斯·曼说，^①“在我们的时代，人类命运的涵义是通过政治语汇来昭示的。”在大学里的许多学究看来，这当然是对的——那些冬烘先生们相信，一个人不管是在读诗，还是在偷情，他必定同时也在表达一种政治观点。以常识判断，这一看法之荒谬并不下于认为“人类一切行为都是性表露”的那种庸俗化弗洛伊德观点。叶芝^②曾经这样评论托玛斯·曼的话：

那姑娘在眼前亭亭玉立
什么古罗马、俄罗斯
还有西班牙政治
我哪有心思读下去？

这里我们要把握的是常识。在政治中一切都是真实的，政治中讨论的问题只有对或错的分别（或多或少如此）。人们真的流血，真的死亡。政治艰难地支撑着一个平常的世界，我们可以在里面彼此交谈；而哲学家们则将人的经验化解为观念、眼界、知觉元素^③、价值观、主流、文化等等，

① 托玛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德国作家。

② 叶芝（W. B. Yeats 1865—1939），爱尔兰诗人。

③ 知觉元素，英文为 *sensa*，是经验主义学派使用的哲学名词。这一学派认为，经感官获得的知觉元素构成了人的认识。

本书随文注释为译者注。

他们将摧毁这个平常世界。政治是一种活动，它支撑着人类生活的框架；但政治并不等于生活。怀疑主义哲学家、道德相对论者、激愤的社会批评家、宗教理想主义者、富于幻想的预言家，这些人在我们的文明中都有自己的地位，但他们对政治的干预却是一种不愉快的经历，近两个世纪以来尤其如此。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尽管能为生活的许多方面建立秩序，却必须与上述领域保持一定距离。然而政治活动的确是一种浓缩的生活，充满了英雄主义和尔虞我诈。要想知道政治就必须懂得，政治是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千变万化的。

本书是一部政治学导论，打算在极短小的篇幅里，既从学术也从历史的角度来描述政治。本书试图将政治活动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讨论，同时也要纠正一些错误观念。然而笔者完全懂得：一种观点在一个人看来是奇谈怪论，却可能被另一个人当作至理名言。

肯尼思·米诺格

1994年9月

目 录

第 一 章	政治中为什么没有专制者的位置	1
第 二 章	古希腊人:怎样做一个公民	10
第 三 章	古罗马人:爱国主义的真正涵义	19
第 四 章	基督教与个人精神的兴起	25
第 五 章	建立现代国家	33
第 六 章	怎样分析现代国家	42
第 七 章	国家间的关系:如何保持均势	51
第 八 章	政治的实践(之一):怎样做一个参与者	61
第 九 章	政治的实践(之二):政党与政治信条	72
第 十 章	政治的实践(之三):正义、自由、民主	80
第十一章	科学地研究政治	88
第十二章	意识形态向政治挑战	96
第十三章	21 世纪政治会消亡吗?	105
本书作者推荐书目		114
英中译名对照		116

第一章 政治中为什么没有专制者的位置

据说巴格达古王哈伦·拉施德^①常会乔装成乞丐出宫访察民情。聚集在绝对权力周围的谄媚者们包围着哈伦，他只有使用旁门左道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哈伦就是那个著名的伊斯兰国王，他宣布将仙露萨德处死，可是仙露萨德会讲好听的故事，讲了一夜又一夜，一共讲了一千夜。哈伦听得入迷，一再推迟执行死刑，最后竟娶她为王后。这著名的故事生动地描绘出专制体制的形象：那种政体的秩序靠武力来建立，以恐怖来维系，朝令夕改，反复无常。

在专制政体中，秩序的最高准则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好恶。然而专制体制也不是完全不讲正义的：正义在十分传统的社会里也普遍流行着——习俗主宰一切，人们把普遍流行的正义观念当作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在一个神授的体系中占有自己的位置。朝代的兴衰更替遵循着中国人常说的“天命”，但对农民来说，生活并没发生多大变化。君主的智慧主宰一切。公元前十一世纪，以色列人和腓力斯人发生了冲突，以色列人便到统治他们的先知撒母耳那里说，他们需要一个既能治理他们，又能带领他们打仗的王。撒母耳不赞成这个要求，还警告他们说，这样的王将会剥夺他们的财产，奴役他们的体魄。但以色列人仍然坚持要像别的民族

^① 哈伦·拉施德 (Harun Al Raschid 766—809)，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统治者，以残暴和骄奢淫逸闻名。

一样，立一个王。在当时的中东，“王”就是一个用专制的方式对待民众的统治者，与欧洲立宪制下的统治者很不一样。实际上，以色列人很幸运地拥立了索尔、大卫、所罗门这些著名的君王，他们使以色列人享有了一段短暂的安定，甚至为以色列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声誉。所罗门对两妇人争夺同一婴儿案的裁决^①只是他传奇式智慧的一个最脍炙人口的例证。然而即便是这些贤明的君王也会采取暴虐的举措，最后所罗门规模浩大的工程所带来的沉重负担终于导致了以色列的分裂。

“专制主义”是一个笼统的名称，它包含许多不同的类型。非欧洲的各种文明几乎全都不可避免地被不同形式的专制体制统治过，而西方的思想创造则总是遭到各种专制统治者的敌视——从残暴的埃及法老到精神狂乱的罗马君王如卡利古拉和尼禄，还有印度和中国那样的远方异邦的皇帝。在欧洲，追求专制权力的人必须把自己伪装起来。欧洲人有时会被某种以诱人的理想主义面目出现的专制体制所蒙蔽——希特勒和斯大林就使用过这种手法。这一事实提醒我们，专制主义的危险在时间和空间上离我们都不远。许多国家至今还在专制主义统治之下，它随时都可能带来痛苦和死亡，人们就像生活在疯人院里。

今天我们将专制主义（连同专政和极权）定义为一种政体。这会使古希腊人大为惊骇，因为希腊人的独特（也是他们的民族优越感）正是他们不同于那些听任专制主义统治的东方邻居。这一观念上的差异告诉我们，政治在我们的文明中占据着如此中心的地位，每当文化和环境发生变化，政治

^① 《圣经·旧约·列王记》

的含义也随之变化。所以，我们研究政治的第一步就必须是摆脱现代固有观念的窠臼。为什么最初曾是某些西方国家的精英所从事的一种有限的活动，如今竟被看作是无处不在的人类关注的焦点？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解释这一过程的来龙去脉。

首先要看一看古希腊人赋予政治的价值观。希腊人最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完全不同于东方人。希腊人赞赏埃及、波斯这些东方帝国的绚丽文化，却又鄙视这些国度的统治方式。他们把这种外国制度称作“专制主义”，因为这种体制下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关系无异于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希腊人是武士，他们鄙夷东方臣民在君主面前匍匐下拜：他们无法忍受公民与当权者之间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两千多年后，我们完全继承了这种对匍匐下拜的习惯性反感，部分的原因是“匍匐下拜”是基督徒用来描述人与神之间的一种意象。谈论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常用“domination”（支配）这个拉丁词。古希腊人说的“despotes”（主人）和古罗马人说的“dominus”（主人）指的都是奴隶主所特有的那种权力。当代有许多语言符号表明人的这种难以泯灭的自我中心意识，例如现代英语中的“dictatorship”（专政）和20世纪出现的“totalitarianism”（极权）。

专制主义的本质是，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都不存在对统治者不受制衡的权力的挑战。臣民的唯一任务就是献媚。没有国会，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政府控制的新闻界，没有独立的司法，法律无法保护私有财产不受强权剥夺。一句话，没有公众舆论，只有专制统治者的声音。奇怪的是，臣民的这种被宰制状态倒使一些专制体制成为精神启蒙的著名发源地。在一个国度里，强权的跋扈也会引发一种回应，富有思

想的臣民转向神秘主义、禁欲的斯多葛主义或是其他消极隐退的信仰。他们在超越感官的精神世界里找到了生活的真谛，而社会和政治生活则被贬低为一种幻象。这种趋势的后果往往是科学技术的长期停滞，只有短暂的繁荣算是例外。

多数社会都起源于军事征服，武力征服之后自然会产生专制制度，所以如果建立的是一种公民秩序或政治秩序，就应当看作是了不起的成就。^① 欧洲人曾在三个著名的历史时期创建过这种秩序，但其中的两次都以公民秩序崩溃而告终。第一次是古希腊的城邦时期，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专制统治者就攫取了政权。第二次是古罗马时期，罗马人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帝国，但帝国的成分实在太庞杂，只有一个专制政权能防止它解体。第一次的经历产生了斯多葛主义和其他的隐世哲学，第二次历史经历则为基督教播下了种子。中世纪型的政治产生于基督教和西方的原始国家，从中世纪政治又衍生出我们现代的政治制度。既然我们依旧生活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就只好附在历史的飞翼上旅行，我们不知道前进的终点究竟在何方。

然而我们的确知道，虽然反对专制曾是西方政治传统的主要基石，但如今人们对专制的抵制已经变得暧昧起来。近几个世纪以来许多人曾梦想运用专制政权所独有的无法抵御的力量来清除我们社会中明显存在着的弊病。在欧洲，专制主义的政治方案，即便十分富有哲理和识见，也会遭到失

① 作者有意区分专制（despotism）和政治（politics）这两个概念。政治专指以古希腊传统为代表的治理方式，所以政治体制中不包括专制政体。因此，本章标题中说“政治中没有专制者的位置”。实际上，本书中的“政治”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政治即此章所说的与专制相对的政治，广义的政治指所有的政治，专制主义自然也包括在内。

败，除非是把它真实本质掩盖起来。既然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舞台表演，人们就很容易发明出新名称、新观念。在20世纪以各种极权主义形式出现的专制体制构筑了一个广大的政治实验场，各式各样创建完美社会的政治设想都在这里进行了演练。这些试验都失败了，这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但许多人却没有认识到，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必定与隐藏在我们文明深层的某些倾向相关联。因此，要研究政治就不能不研究某些征兆——它们或许能揭示我们文明中某一个断层的深处隐藏着什么。

一个众所周知的线索就是衡量私人生活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私人领域指的是家庭生活以及个人良知的领域——个人良知即个人凭自己的意愿选择的信仰和兴趣。这种私人领域存在的先决条件是：具有统治权威的国家公共领域支持一个维护公民自主关系的法制体系。具有统治权威的公共法律体制对自己的权力进行限定，惟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政治才能存在。正如伯里克利^①在纪念伯罗奔尼撒战争头一年阵亡的雅典人葬礼上发表的著名演说中所说：“在私人生活中我们自由而且宽容；但在公共事务中我们严守法规。”当然，无论法律还是公民的态度，划分公共事务和私人生活的实际界限总是在变化。同性恋和宗教信仰过去曾受到公共领域的规限，现在则基本上属于私人领域；然而婚内强奸和残害幼年子女却越来越多地受到法律的干预。政治与专制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承认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我们这里说的政治可以粗略地称作自由民主政治。

在古典的专制国家，社会中的一切都是专制主的私产，

^① 伯里克利（Pericles 495 BC—429 BC），古雅典政治家。

但现代社会“公”与“私”的界限却被从另一个方向一步步侵蚀了：私人领域受到公共领域限制的部分在逐步扩大。如果任何引起争议的问题都被称作“政治”问题，如果像一个流行的口号说的那样：“个人的一切都属于政治”，那就没有一样东西是在政府控制的范围之外了。这种口号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然而它却是 20 世纪极权主义的基本准则，其后果显然是将个人限定在一个单一的控制体系之内，毁灭现代国家一直承继着的传统：经济、宗教、文化、社会、法律等不同的角色相互独立，各司其职。

“个人的一切都属于政治”之类口号都是伪装成真理的行动计划。这类口号的意思常是模糊的，但口号中隐含的观点一遇气候便会活跃起来，要求实行与我们珍视的如个人自由之类价值观相抵触的政策。人们说，只有提高警觉才能保持自由，而警觉的一种重要形式就是留意政治语汇，这种语汇常能揭示事情的真相。

研究政治学首先就要注意变更的迹象。政治是一个幻觉舞台，粗心的观察者看不出它的底细。现实与幻象是政治研究的两个中心课题。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和机构的名称。目前世界上流行的主要是西方政治模式，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有一种政治体制，还有一套相应的机构和制度：议会、宪法、公民的各种权利、工会、法庭、报纸、部长，等等——看起来全世界的政治都在按照同一种模式运行。事实却绝非如此。比如说，日本有一名被称作首相的政府官员，外国政治家就常闹误会，他们会很失望地发现，日本首相从不能像其他国家的首脑那样颁布国家政策。1936 年斯大林颁布了据说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宪法，为苏维埃公民提供了大量权益和保障。但事实上就在颁布这部宪法的同时，斯

大林正在用假审判的手段对苏联高层人士进行“清洗”。成百万的臣民被枪决。政客爱撒谎，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最让世人迷惑的却是名称与现实之间的这种扑朔迷离的关系。

首先，“政治”这个名词本身就含义暧昧。一个概念如果过分地延伸就会断裂而失去作用。“政治”本来只指君主、国会、部长们的活动，还包括那些帮助或阻碍这些人物取得权力的政治参与者的活动。除此之外的一切活动都属于社会生活或是私人生活的范畴。随着政府权力的扩张，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以某种方式贴上了“政治”的标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这里仅举一例：政府总是要把一切好事都归功于自己，反对党则总是要把一切坏事的账都算到政府头上，于是政府和反对党就在合力传播着一个观念：一切事情，不管好事还是坏事，都是政策造成的。这种观念使得臣民们遇事就去向政府请愿，似乎一切利益都可以由政府来施舍。这种做法又反过来加强了“一切事物都是政治”的观点。

还有一个因素导致政治的功用和涵义被无限扩大。在欧洲，从远古以来政治就一直是君主和大臣们从事的活动，历史主要描述的是他们的业绩。参与政治就等于获得了永生。1952年菲德尔·卡斯德罗在古巴第一次夺取政权失败，在法庭上他为自己辩护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他把自己看作一个历史舞台上的演员。凡欲垂名青史的人都会去从政。本可能成为克伦威尔^①的人们由于命运的安排“未能在疆场

^① 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1658），曾领军推翻英王查理一世的统治，成为共和国的首脑，称“护国公”。

上驰骋厮杀”，他们再也不甘愿默默无闻地老死在宁静的乡村墓地。^① 他们要去从政。法国革命将这种荣誉带给了本该默默无闻的人物如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夏洛特·科代、圣鞠斯特等。革命者是往历史上胡涂乱抹的艺术家。这是极端的例子，而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希望不朽的热情以较为温和的形式在人人可投一票的普选中得到了满足。普选当然是一种通货膨胀，它使选票贬了值，但我们仍然认为选举是一个体面公民享有的重要权利。“艾丽丝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这是英国报纸的一条大标题，报道一位南非黑人妇女 1994 年第一次投票的情况。

我们现代人（尤其是那些自认为生活在后现代的人们）特别容易对政治的本质产生误解：我们想出了种种巧妙的理由来证明我们的思想比我们的祖先高明得多。所有的文化都认为惟有自己信奉的观念最正确，然而今日受过教育的人们尤其无法摆脱当代各种偏见的束缚。比如说，进化的观点，就使许多人认为，我们的思想都比前人的那些当然有缺陷的观点更伟大。当代流行的思潮的确否定了进化的观点，并明确指出我们的观念带有浓厚的本时代和本地域的烙印；它还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平等的。表面看来，这种思潮像是一种怀疑主义，将我们从自己祖辈的傲慢中解放出来，因为它好像是把我们的观点降到了与世界上其他人同等的水平。这其实只是一种假象。当代流行的怀疑主义是一种虚伪的恭谦，它掩盖了这样的一个顽固的信念：我们的开放心态使我们的

① 作者引自著名英国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 1716—1771）的抒情诗《墓园挽歌》。原句大意为“这里或许安息着：某一个未能扬名文坛的密尔顿/某一个未能征战疆场的克伦威尔”。

相对主义人文观 (relativist humanism) 比前人的僵化和异族文化的褊狭都要高明得多。

因此，撰写政治学著作的人必须警惕自己所处时代的狭隘偏见。在当代这种危险性决不低于往昔。人们广泛地意识到这种危险性，所以政治学一直是文科教学中的一门主课。希腊和罗马贵族学习法律、哲学、公共讲演术，以便完成血统高贵者才配承担的政治使命。政治成了一门核心课程，是因为它很快就变成一种自觉的活动。政治活动促使人思索，并产生出一批极优秀的著述。哲学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探索过政治的概念；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生动地记载了政治演进的过程；政治学家如亚里士多德研究过各种政体以及政治制度运作的情况；伊索将政治智慧用寓言表达出来；著名的演说家如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创造了最有说服力的论辩形式；诗人写作政治题材的哀歌和讽刺诗，而历史事件中的政治场景最能激发莎士比亚等戏剧家的灵感。没有一种人文学科或艺术创作从不涉及政治题材。

许多学术和艺术作品都是政治的镜子，只有把那些意象拼配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认知体系，我们才能把握它们的真谛。我们从急功近利的政治家和清高超脱的学问们那里都能学到不少东西，应当把对二者的研究结合起来。马基雅维里^① 追寻政治的“有效真理” (effective truth)，那只不过是政治活动家服务的。“有效真理”有许多疏漏。我们必须从我们政治概念的奠基者——古希腊和罗马人那里开始，先讨论一下他们的各种不同观点。

① 马基雅维里 (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

第二章 古希腊人： 怎样做一个公民

对于古代希腊人来说，政治是一种新的思想方式，新的感觉方式，尤其是一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公民们在财产、容貌、智力方面各不相同，但作为公民他们都是平等的。这是因为公民们都是理性的人，而理性人类间唯一合理的关系就是说服。说服与命令的不同之处是，前者认为讲话的人和听话的人处在平等的地位。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录《克里托篇》(Crito)中对这种政治生活形式作了杰出的描述。哲学家苏格拉底因腐蚀青年罪被判死刑，有人要帮他逃离雅典，他拒绝了。苏格拉底说，逃跑就意味着在理性上背离他用毕生行为来表达的对雅典城的忠诚。甚至行刑的方式也反映了一个基本信念：暴力不是处理公民间关系的妥善方法——他被准许饮毒自尽。希腊人自愿地遵守他的雅典“城邦”(polis)的法律，而且以此为荣。苏格拉底本人的存在与他的雅典城邦不可分离。最糟糕的命运是放逐，那是一种对公民身份的剥夺，通过“贝壳放逐法”^①将公民们认为对雅典政体构成威胁的那些政治家放逐到国外。

我们在希腊人那里看到实现自由的主要条件：人与人的关系完全平等，大家都只服从于法律，大家轮流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希腊人是历史上最先创造出这种社会的人民；他

^① 贝壳放逐法 (ostracism)，古希腊通过公民用贝壳或陶片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对某政治人物施行放逐。

们当然也最先撰写出探索这种生活经历的著作。政治是专门由新出现的称作“公民”的人们从事的活动。政治可以具有多种形式，甚至像僭主和篡位者当权的那种低劣的形式，但后期希腊人都毫不动摇地相信：东方的专制主义不是政治。

以上所说是形式上的准则。希腊的各种准则在我们的文明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现实当然要复杂得多。平民派与寡头集团在城邦内斗得你死我活。农民生活在贫困中，庄稼歉收时他们就可能沦为抵债的奴隶。城邦内的平等并没有给城邦间带来平等，战争成了流行病。希腊人是善谈而又热情的民族，他们的政治常充满暴力，有时还会发生腐败。但这些都妨碍他们取得辉煌的业绩，例如他们曾胜利地击退（最后征服了）邻国波斯。大量阅读希腊时代的文献会让人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代人：这些理性的古人越过数千年历史向我们——希腊文化的后裔讲话，用一种好像很容易理解的语言。然而尽管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他们仍和我们有极大的差异，如他们的宗教、习俗、对人生的看法。正是这种差异使研究希腊文明成为极有兴味的工作。

古希腊人是人文主义者，但和当代的人文主义（经过基督教的改造）大相径庭。他们的基本信念是：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类生活的意义在于实践自己的理性。人如果屈服于感情就可耻地沦为了低等动物。如果傲慢或狂妄使人以为自己和上帝一样伟大，他们就是忘记了自己人类的弱点，这样就会惹怒上帝而遭到毁灭性的报应。人类生活的秘密是有自知之明，并适度地表现自己的作为人的能力。在探讨法律和公共政策的时候人类找到了最高最纯粹的自我表达形式。只有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才能享受到这种自我表达的快乐。

人文主义者常把希腊人当作自己的鼻祖，但希腊人的世